

三年游击战争资料汇编

中共永定县委党史办公室编

目 录

1. 闽西三年游击战争----- 张鼎丞、邓子恢、谭震林(1)
2. 坚持三年游击战争(节录)----- 张鼎丞(57)
3. 三年游击战争----- 方方 (86)
4. 战斗在敌人后方——回忆工农红军独立第八团的
一段斗争史----- 魏金水 (190)
5. 抗日战争时期的片断回忆(节录)----- 梁国斌 (208)
6.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闽西南军事政治委员会布告 第一号
——为接受中央政府抗日讨蒋命令宣布改选事----- (226)
7.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闽西南军事政治委员会布告 第二号
——宣布闽西南民众抗日讨蒋纲领----- (229)
8. 福建抗日统一战线初步行动纲领----- (233)
9. 在为和平而奋斗的两个月中----- 邓子恢 (244)
10. 对国民党的新认识与新态度----- 张鼎丞 (254)
11. 中国共产党闽粤赣省委委员会为对日抗战保卫漳厦宣言----- (264)
12. 由“不服从命令”说到“视为土匪严予惩办”----- (269)
13. 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快邮代电----- (275)
14. 邓子恢同志在“一二·八”六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讲词----- (278)
15. 张鼎丞同志在“一二·八”六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讲词----- (282)
16.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二支队全体指战员为出发
抗敌告别父老书----- (284)

17. 陆军新编第四军第二支队司令部致张专员函----- (287)
18. 开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----- 张鼎丞 (294)
19. 新四军二支队答谢闽西群众慰劳的一封信----- (299)
20. 中共永东特区委“关于反对敌人烧杀移民政策”的指示----- (302)
21. 永良县军政委员会主席阮文松付主席马发贤、罗兆键
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五日反对缴纳土地税告全永民众书--- (309)
22. 永良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范钦洪、付主席马永昌
 一九三六年七月六日为秋收斗争告永良工农书----- (312)
23. 邓子恢发表龙岩民众抗敌意见----- (315)
24. 在统一战线中的几个错误倾向----- (316)
25.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坚持游击战争方针的制定----- (318)
26. 摘录敌伪报纸资料汇编----- (323)

閩西三年游击战争

张鼎丞

邓子恢

谭震林

原编者按：这是一篇关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七年閩西游击战争的总结性文章，是我党党史，我军军史的重要一页。通过这篇文章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閩西革命斗争最艰苦、最复杂的年代，閩西党和人民经受了什么样的严重考验，閩西党在两条路线斗争中，怎样克服了“左倾”路线，恢复了正确的毛泽东路线，从而取得了政治上、军事上的巨大胜利。文章通过大量史实，生动而具体地说明了错误的路线、政策、策略给革命事业所造成的损失，而党的正确路线、政策、策略却是无往而不胜利的。

这篇文章共分六部分：一、“左”倾路线给閩西带来严重恶果；二、艰苦卓绝的一九三五年；三、抗日反蒋新局面；四、一切为了实现和平推动抗日；五、閩西南红军终于开赴抗日前线；六、毛泽东路线的胜利。

第三次“左”倾路线对党的统治，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发展到了顶点。六届五中全会盲目的判断“中国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阶段——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”；判断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斗争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，说这一斗争将决定中国的“革命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”，因而便在政治上、军事上、经济上和组织上造成了有系统的错误，严重地危害了革命。“左”倾机会主义者在政治上实行“超左”倾机会主义者在政治上实行许多超民主主义的所谓“阶级路线”的过左的政策。例如在苏区实行地主不分田，富农分坏田；从肉体上消灭地主，经济上消灭富农；反对资产阶级，盲目提高工人工资等。在军事上不能客观地考察敌我力量对比，无视当时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，而以寸土必争的阵地战，代替了毛主席一贯坚持的、多年来行之有效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战略方针；不注意地方武装建设。在苏区大举扩军，武器集中，单纯依借主力进行所谓的“正规战”。在经济上，动员苏区全部财力、物力，支援同强大敌人拼消耗的战争，致使苏区社会经济遭受严重困难。在组织上，则在反对“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”和反对“用两面派态度在实际工作中对党的路线总工”等口号之下，发展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斗争和打击政策，并继续推行“逼、

供、信“的肃反政策。”左“倾机会主义者”在闽西所发动的反罗明的路线斗争，更造成了党内恐惧心理和社会不安的现象，造成了党群之间、上下级之间严重的脱节现象。“左”倾机会主义者在边区和接敌区除了采用和中心区同样的错误政策外，还拒绝利用两白政策，过分强调人力、财力、物力的集中上缴等。在群众对敌斗争上则拒绝游击战和合法斗争相结合的方针，他们骂群众一时上山一时下山的跑反斗争为“动摇”，骂群众对待敌人某些不得已的应付行动为“反水”（意为叛变）；他们不是让群众坐受敌人摧残，便是迫使群众作无希望的斗争，因而使群众在对敌斗争中长期陷于左右为难，进退失据的境地，大大地便利了敌人进攻。

“左”倾路线在苏区统治的最大恶果，就是导致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，被迫长征。在红军主力长征后，“左”倾机会主义者继续执行着危害苏区和红军的方针政策。当时中央苏区尚有部分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，加上伤病员达三万多人，如果能有计划地及早布置游击战争，与敌人长期周旋，那么当时中央苏区将出现一个新局面，当时的红军主力和地方武装也将保存一个很大的力量。但是以项英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却仍然采取“保卫苏区等待主力回头”的方针，在这错误方针下，把苏区地方武装的人员、武器绝大部分集中，编成红军二十四师，并将能勉强出院的伤病员都动员到主力部队去，同敌

人打硬仗。这样做的结果，不仅没有加强地方武装，反而大大削弱了地方武装，虽然十一月间红军二十四师在瑞金和会昌之间歼灭了敌人一个旅，但对于当时基本形势并没有丝毫改变，反而给敌人造成了四面包围的有利机会。四都南部和会昌城两次战役，红军二十四师终于全部被歼，中央苏区至此全部沦陷敌手。

福建军区在省委书记万永诚同志的领导下，同样执行了“左”倾路线，当敌人占领了汀州城，省级机关退守四都的时候，军区还直辖两个主力团（红十九、二十团），各县区有些地方武装；如果及早布置，分散进行游击战，那么闽西也将出现一个更好的局面。但当时省委并不作此打算，而是将这些部队集中到四都山上狭小的圈子里，继续进行“保卫苏区”的战争。当时毛泽覃、罗化成两同志建议“放弃四都，将部队编成几个支队，四出袭击敌人，领导中心退到闽粤赣边深山中去，”但省委拒绝这个建议，天天将部队埋伏山头，等待敌人进攻，企图打一个歼灭战，以改变当时的不利形势。结果是事与愿违，我们部队被敌人歼灭，万永诚和其他许多同志光荣牺牲了。

由于扩军过多，大量消耗了苏区人民的人力、财力、物力。红军长征后又把县区队员武工集中，县区赤色少年模范队员只留下一些土枪、梭标、土炮，当时整个苏区党在思想上没有游击战争的准备，又缺乏有作战经验的部队和军事骨干，因此在

红军二十四师和福建军区两个团被围歼，地方武装被歼灭瓦解之后，苏区人民差不多陷于无抵抗状态。从旧县河以西地区一直到汀江以东，除了汀瑞边境有钟德胜、胡荣佳、刘国兴诸同志所领导汀瑞游击队百把人活动外，几百里范围内的广大地区，长期没有人民武装活动，敌人和地主阶级很快便建立起白色恐怖统治，到处修马路，筑碉堡，在乡村成立壮丁队，配合敌军作战。一九三五年三月间，震林、子恢从苏区带队伍回到上杭、永定，沿途都遭到这些壮丁队的袭扰，找不到向导，买不到粮食。沦陷不久的苏区竟形成这种极端不利的局面，这不能不说是“左”倾路线统治的另一严重恶果。

“左”倾路线统治又一严重恶果，是部队中相当长期残存着他们的影响，许多留下来的部队善于打仗，不善于做群众工作，善于强攻硬打，猛打猛冲，而不善于避实击虚，避强攻弱，不善于与敌人打“圈子”，进行灵活的游击战，习惯于单纯军事行动，而忽视游击基点和游击根据地的逐步建立。这就是我们转到敌后的许多部队受到不应该损失的根本原因。

第三次“左”倾路线在苏区统治的结果，导致红军被迫长征，整个中央苏区沦陷，敌人很快建立了白色恐怖统治。一九

三五年春间，我们转入敌后，闽西游击战争^{全占}开始的时候，我们面临着极端严重的困难。当时情况是：

一、在敌人方面

(一) 敌人大军压境，仅在松岩、上杭、永定、长汀、宁化、清流、连城、宁洋、漳平、南靖、平和等几个县，就布置八个正规师（即三师、九师、十师、三十六师、八十三师，五十二师，七十五师），以李默庵、李玉堂为指挥官，并纠集地方民团，壮丁队，铲共团等一切反动武装对我们进行“清剿”。

(二) 敌人对付我们的军事手段，是利用它已经建立起来的反动统治强迫群众到处修公路，筑碉堡，一发现我们的队伍，敌军主力便“跟踪追剿”“围剿”，而驻守碉堡的民团，壮丁队则据守碉堡进行堵击，谓之“堵剿”，有时沿山隘伏击、放冷枪，配合敌军主力搜索，则谓之“搜剿”。

(三) 在政治上敌人对付我们的手段，主要是采取“隔离政策”和“瓦解政策”，特别在一九三五年八、九月以后，敌人看到我军与人民群众的亲密关系，单凭军事行动无法消灭我们，便采取了“移民并村”、“计口购粮”、“保甲制度”、“连坐法”等极端残酷的办法来对付我们。所谓“移民并村”，就是将山区五十户以下的小村庄居民，全部移到大乡村居住，并且筑起炮楼监视他们，在敌军“清剿”期间，不准居民进山，否则“格杀勿论”。所谓“计口购粮”，就是要“清剿”区群

众按人口购粮，多买者以“济匪”论罪。所谓“保甲制度”，就是一村编为一保，十户编为一甲，保甲长由他们委任。居民外出和移居，都要得到保甲长允许，有外客来要向他们报告。所谓“连坐法”，就是要保甲长兴结，保证“不藏匪、不济匪”，如果一家济“匪”藏“匪”不报告，保甲长就要杀头，十家全杀光。上杭有个村子就在这种“连坐法”的名义下全村三十多口人全被杀光了。此外，敌人还强迫群众组织壮丁队，日夜放哨，看见我军过境时便鸣锣报警，以便追击我们，随后又对群众造谣说我军要来报仇。所有这些办法，主要是企图把我们与群众隔离开来，便于消灭我们，敌人把这个办法叫做“抽水捕鱼”。

（四）敌人对付我们内部的“瓦解政策”就是所谓“自新自首条例”，“这是从一九三一年以后敌人很厉害的一着。由于敌情紧张，斗争困难，党和军队中有个别意志薄弱、思想糊涂、立场不坚定的人以及阶级异己分子被敌人引诱出去，敌人使用各种极其残酷毒辣的办法，强迫、利用这些人来破坏我们的党组织，交通站、接头处、采购站等，为了瓦解我们部队，敌人还强迫红军家属到山区来喊他们的子弟回去。

二、在群众方面

（一）由于“左”倾路线的错误，当时闽西各地，群众独立对敌斗争的力量大大削弱了。岩（龙岩）杭（上杭）永（永

定)老区群众在对敌斗争中又相当长期存在着无所适从的心理状态。(二)一九三五年夏间,中央苏区全部陷落,岩、杭、永各县在江西的难民被押送回来,他们说:“老红军一天天去远了,苏区被白军占领了。”这个消息很快在群众中传开,地主富农、坏分子很高兴,而雇、贫、中农则心灰意冷,站长失败情绪。

(二)由于情况紧张,敌人又实行分化政策,各县都出现了一些叛徒。这些叛徒叛变后,立即带引敌人来摧残与我军我党有关系的群众。敌人经常在夜间化装红军向群众叫门,叫开了门就捕人,这样又增加了群众的恐怖情绪,连英红军去叫门时群众也往装睡大觉,不敢开门。

正因为上述种种情况,当时闽西一般群众情绪表现消沉,特别是“左”倾路线统治较久的地区,群众消极情绪就更普遍。反革命统治很快复辟,农民在土改中分得的土地大部分被地主富农收回,并进行反攻倒算。我们当时活动的主要地区还是面临较早的岩、永、杭老暴动区,这些老区群众不仅阶级觉悟比较高,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,懂得运用各种斗争方式与敌周旋,而且受“左”倾路线统治较短时间,影响不深。当时这些地区群众的主要要求是避免敌军烧杀迫害,抵抗敌人苛捐杂税,保持土地不被收回,这正需要游击战争与群众合法斗争相结合,这就是我党与农民群众的共同要求,也就是游击战争之所以能

够成为群众性的政治基础。

三、在我们党和群众方面

(一) 闽西部分地区的游击战争，从一九三四年便已开始，当时为牵制敌人向中央苏区进攻，配合主力红军粉碎敌人的第五次“围剿”，红军独立八团在丘金声、丘织云、魏金水、伍洪祥诸同志率领下于一九三四年春便到达龙岩，在漳、岩公路沿线积极活动，同时在永安、宁洋、漳平、连城之间，又由吴胜、方方、谢育才诸同志率领的红九团在活动。一九三四年冬间，敌人进占长汀前后，又由朱焱（后来叛变）、罗忠毅、赖荣传、贺万德诸同志率领明光独立营转入岩、连、宁边界配合红九团活动。红十七、十八团在大田被敌人击溃后，还有百把人由温含珍、丘尚聪率领到达龙岩、溪口与方方同志汇合。上杭、永定、龙岩的地方武装，也在敌占区分头活动。为了打开永定局面，上杭独立营亦于是年冬间由黄火星同志率领向永定挺进，以后又转回上杭与方海涛同志汇合，在上杭坚持游击战争。一九三四年年底，鼎丞奉命回永定活动，当时省委未给武器，鼎丞只在永定窑坑难民中动员一些人带少数步枪、手榴弹，同范乐春、刘永生、简载文、陈茂辉诸同志回到永定。一九三五年三月间，经陈毅同志建议，项英才派震林、子恢率领一个支队，经过四都、河田、朱雷、才溪、紫金山、旧县、岩下山、白沙、双髻山、大岭下，突破敌人重重封锁围攻，回到永定与

鼎丞汇合，组成闽西南军政委员会。至此，闽西各县的游击战争才逐渐地全部开展起来。

(二) 由于“左”倾路线的错误领导，不仅留给闽西坚持游击战争的武装部队很少（当时除了红八团、红九团、明光独立营，谭、邓带回的支队，红十七团、十八团一部等共约一千二百人左右以外，岩、杭、永三县只有近百条步枪）而这些部队除了红八团转入敌后较早，作战比较灵活外，其余部队一般受“左”倾路线影响较深，损失比较大，如谭、邓带回的支队，虽是一个主力加强营，近五百人，但沿途经敌人截击追击，损失过半，支队长中途牺牲，到永定后大阜一役遭敌人包围，最后只剩下一百多人。红九团战斗力比较强，前期作战比较灵活，消灭了岩、连、宁边华卫桥、周焕文等许多地主武装，建立了大小块根据地，但后期转到闽南后则经常集中行动，猛打硬攻，伤亡较大，长期不注意建立游击根据地，缺乏群众工作，政策上缺乏灵活性，结果遭受很大损失。

(三) 由于当时敌人大军压境，闽西全境沦陷，我们没有自己的根据地，没有后方机关，兵员无法补充，俘虏一个也不敢收留。当时部队是打一个少一个，部队给养全靠打土豪，筹款，医药补给则依借群众代买代制，伤员只能隐伏在山寨上，借群众草药治疗，当时困难情况真是一言难尽。

(四) 当时一般部队包括红八团在内，有一个共同缺点，

就是部队活动多，群众发动少，不善于做群众工作，不善于组织群众利用合法的斗争，不善于利用两面派，这样就使得自己武装的效果缩小了。

根据上述敌情、民情、我情的分析，可以看出当时闽西阶级力量的对比，显然是敌强我弱，我们是处于劣势地位。因此，我们的战略方针只能是开展广泛的、灵活的、群众性的、胜利的游击战争。在军事上粉碎敌人的“清剿”，保存有生力量锻炼现有部队；在政治上保持党的旗帜，保持党与群众的密切关系；在组织上保持党的纯洁性，战斗性，保持各地领导骨干安全与团结。这些都是为了从保持力量，积蓄力量，到发展壮大革命力量，等待有利时机的到来，从局部恢复小片根据地到大面积地恢复发展根据地，以开展新的局面。这就是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所决定的斗争方针和基本任务，这也就是我们在大胆地改变“左”倾路线以后所制定的新方针和新任务。所谓“广泛性”，是指游击战争的范围不限于狭小地区，而是依借现有地区、不断向新区发展，使得烽烟遍地，敌人疲于奔命，无法应付，逐渐削弱，而我们则日益发展壮大，最后形成新的有利形势。所谓“灵活性”，是指游击战争的战术，时而集中，时而分散，时而活动，时而隐蔽，声东击西，神出鬼没，使得

敌人捉摸不住，而我军则处于主动，立于不败之地。所谓“群众性”，是要使游击战争不限于部队的军事活动，要协同地方党去领导群众斗争，使群众利用合法的斗争转到非法斗争，从和平斗争转到武装斗争，从游击小组的秘密活动转到游击队的公开活动，这样来多方牵制敌人，打击敌人，配合部队作战，并且使部队逐渐发展壮大。所谓“胜利的”，就是奉行毛主席多年来规定的游击队作战原则，即敌情不明不打，无胜利把握之仗不打，有胜利把握但要伤亡过大的不打。不仅要打全胜之仗，而且打后要使群众不受摧残或少受摧残。

为了便于掩护部队活动，掩护群众斗争，我们当时还注意运用两派政策，用各种办法消灭保甲长中最反动分子，争取中间分子成为“脚踏两只船”的两派。有的地区则布置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、“白皮红心”的革命两派去充当保甲长和壮丁队长。这是闽西群众在长期斗争中行之有效的斗争方式，在当时最困难的环境中这种斗争方式更有其重要作用。

方针任务定下来了，借谁去执行呢？我们当时采取了如下的布置：

（一）在军事部署上，以红九团的第一营和岩、连、宁独立营（即后明光独立营）成立闽西南第一军分区，以罗忠毅为

司令员，方方为政治委员，温含珍为政治部主任。这个分区仍在岩、连、宁（即龙岩、连城、宁洋）一带活动。红八团和龙岩游击队成立闽西第三军分区，以邱金声兼司令员，丘织云为政治委员，魏金水为政治部主任。这个分区仍在龙岩、南、漳（龙岩、南靖、漳平）一带活动。这两个分区的任务，是要尽可能扩大游击区，选择条件较好的地区发展和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。以红九团的第二营、第三营和永东游击队成立闽西第二军分区，以吴胜兼司令员，谢育才兼政治委员，赖荣传兼政治部主任。这个分区的任务是开辟永定、平和、大埔、饶平、云霄、漳浦各边区，与闽南红三团取得联系。漳、邓带回来的支队除编入上杭、永定两县游击队以外，还拨一个重机枪排编入红八团。岩、永、杭各县游击队则在本县境内活动。

（二）在党组织上成立四个县委，永定县委书记范钦洪（以前是黄火星，以后是范乐春、刘永生），永东县委书记马发贤，上杭县委书记卢海涛，龙岩县委书记魏金水（以后是吴作球）。

（三）军政委员会内部分工是：鼎丞任主席，震林任军事部长，子恢任财政部长兼民运部长，上杭永地委（属福建军分区）书记郭义为同志任党务部长（郭同志不久被俘牺牲），朱森为参

谋长。

(四)在交通联系上,把原来的工农通讯社改为闽西南交通站,保持与上海中央机关的联系,并与各分区各县委建立便衣武装的交通联络,交通联络站站长雷德兴同志。

(五)为了深入下层,传达上述方针政策,并避免领导人过分集中可能遭受意外损失起见,我们几个人也分开活动。方方仍回岩、连、宁一分区,震林到上杭,子恢到永东,鼎丞留在永定,谢育才与吴胜向闽南活动。

第一次军政委员会会议是一九三五年四月间在永定溪南里召开的。当时正是大阜战斗部队受损失以后,敌八十三师在溪南里一带连续搜行搜山,情况异常紧张,因此会议结束后大家便分头出发。但不久就发生朱森叛变事件。朱森是奉命到龙岩去同红八团联络的,他到龙岩后叛变投敌,并带领敌人来破坏岩永、岩宁沿线的交通站和接头处,使有关群众受到摧残,岩永、岩宁交通线被切断,龙岩局否也紧张起来。敌人以为这一下可以依仗朱森这个叛徒来彻底破坏我们的组织,但是可怜得很,朱森除了破坏这些交通站和接头处以外,其余什么都不知道。相反地红八团却正在这个时候在龙岩、漳平两县之间积极活动。他们时而集中,时而分散,常之穿插于马路碉堡周围,